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YUNNAN MINZU DAXUE XUESHU WENKU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调查与研究

李国文 著



民族出版社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YUNNAN MINZU DAXUE XUESHU WENKU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调查与研究

李国文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调查与研究 / 李国文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6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10988 - 3

I. ①云… II. ①李… III. ①少数民族—古籍—调查
研究—云南省 IV. ①G25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9532 号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调查与研究

著 者: 李国文

策划编辑: 张宏宏

责任编辑: 张宏宏

封面设计: 晓玉工作室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64228001 (编辑室)

010 - 64224782 (发行部)

网 址: [http: //www. mzcbs. com](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810 千字

印 张: 48

定 价: 117.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988 - 3/G · 1773 (汉 82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 序

甄朝党 张英杰^①

云南民族大学是一所培养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高级专门人才的综合性大学，是云南省省属重点大学，是国家民委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全国重点民族院校。学校始建于1951年8月，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得以创立和不断发展，被党和国家特别是云南省委、省政府以及全省各族人民寄予厚望。几代民族大学师生不负重托，励精图治，经过近六十年的建设，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创新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民族问题研究基地、民族文化遗产基地和国家对外开放与交流的重要窗口，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

云南民族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办学层次较为丰富、办学形式多样、师资力量雄厚、学校规模较大、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综合性大学。目前，云南民族大学拥有1个联合培养博士点，50多个一级、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和专业硕士学位点，60多个本科专业，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和管理学9大学科门类。学校从1979年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2003年被教育部批准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招收培养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09年被确定为国家立项建设的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国家级和省部级特色专业、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的数量以及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数、获奖数等衡量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持续增长。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民族语言文化、民族药资源化学、东南亚南亚语言文化等特

^① 甄朝党系云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英杰系云南民族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色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学校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得以形成和完善，特色得以不断彰显，优势得以不断突出，影响力得以不断扩大，地位与水平得以不断提升，学校的改革、建设、发展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校区建设、党的建设等工作不断取得标志性成就。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传承文明，为国家特别是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发挥作用、做出贡献的力度越来越大。

云南民族大学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长期以来，学校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产出了大量的学术创新成果，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和观点，得到了党委、政府的肯定和学术界的好评。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著名民族学家马曜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直接过渡民族”理论，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李维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并直接转化为指导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为顺利完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和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汪宁生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专家，其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为民族考古学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几年，我校专家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多，成果质量高，结项成果中有多项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刊发《成果要报》，报送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发挥了资政作用。主要由我校专家完成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部分、《云南民族文化史丛书》等都是民族研究中的基本文献，为解决民族问题和深化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外，还有不少论著成为我国学术界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迅速崛起，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就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机遇，也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9 年，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云南，提出了要把云南建成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指导思想。云南省委、省政府作出把云南建成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

堡的战略部署。作为负有特殊责任和使命的高校，云南民族大学将根据国家和区域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传承的功能，围绕把学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民族大学”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大学科建设力度，培育和建设一批国内、省内领先的学科；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水平；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抓好科技创新，提高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把云南民族大学建设成为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高水平民族大学，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建设工程的核心和基础，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与重要任务。为更好地促进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加强学科建设，推进学术创新，学校领导班子决定出版《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套文库的出版体现了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当前，我国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办法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我们必须增强科学研究的针对性，加强学术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充分发挥科学研究的社会作用，提高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和贡献度，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提升高校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我们相信，随着本套文库的陆续出版，学校致力于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及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优良传统将进一步得到发扬，学校作为社会思想库与政府智库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第二，本套文库与我校学科建设紧密结合，体现了学术积累和文化创造的特点，突出了我校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我校2009年被确定为国家立项建设的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这是对我校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的肯定，也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也对学校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博士生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它要求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的支持。学科建设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础，我们将按照国

家和云南省关于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的要求，遵循“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创新打造特色，以特色强化优势，以优势谋求发展”的思路，大力促进民族学、社会学、应用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公共管理学等重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将这些学科产出的优秀成果体现在这套学术文库中，以更好地带动全校各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努力使全校学科建设体现出战略规划、立体布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全面发展、产出成果的态势与格局，用高水平的学科建设促进高水平的大学建设。

第三，本套文库体现了良好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规范。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寻真理、创新知识、完善社会、促进人类进步。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有健全的主体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倡导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文库作者要以为国家负责、为社会负责、为公众负责、为学术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严谨治学，追求真理，保证科研成果的内在品质。要谨守学术道德，加强学术自律，按照学术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开展研究、撰写著作，提高学术质量，为学术研究的实质性进步做出不懈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产出有思想深度、有学术创见和有社会影响的成果，也才能让科学研究真正发挥作用。

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关心、支持及全校教学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一定能成为反映我校学科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和汇集我校科学研究成果的精品库，一定能成为我校知识创新、文明创造、服务社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的文库建设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足，恳请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帮助我们将文库的出版工作做得更好。

2009年国庆于春城昆明

前言

李国文

“中华文化”，“古代文化”，“传统文化”，都是一些总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她由 56 种民族所组成。“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文化的总和，它由条条水流积聚而成，汇成一条长河，源远流长，熔铸在各民族的血液里，传承不息。同样，人们常讲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是一个总概念，几千年来，中华各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适应自己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规律和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对“中华文化”的长河来讲，它是支，但对该民族文化的总和而言，它又构成了自己的流，各民族文化的河流，同样由众多支流汇集而成，这当中，千古传承的各民族古籍文献，便是构成这个流中最重要的一支。

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灿烂的古代文化，保存至今的各民族古籍文献，是记录各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无论它的记录方式如何，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在各种记录方式中，它记载了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具体而又庞大的内容，因此，它是保存各民族文化的宝库。各民族用于记录、保存文化的古籍文献，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少数民族古籍，以及少数民族古籍的形成、形式、构成、类型等等，在古籍学、文献学中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传统研究中并未对这些问题作出全面、系统的阐释。后来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开始重视并探讨了这些问题。

讨论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自然要涉及语言和文字。首先是语言。人类的思维和语言，都是人脑这种物质和相关器官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发展出来的高级产物，人类在对自然界的实践和斗争过程中，当人的思维和人类社会发展到了非有语言不可的时候——即“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

步……”^①，作为人与人借以沟通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思维和感情的媒介——语言便开始产生。人类语言一经产生，它便通过其语音、词汇等基本要素，记录、表达、反映社会的存在，储存、传递社会文化信息。其次是文字。文字则是传达和记录语言的特殊符号，是人类交流的辅助工具，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它不是和语言同时产生，而是在思维和语言的基础上，当人们用语言表达感情、思维，表述、记录事物，交流思想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时，而需要以新的形式和手段——即文字作为辅助的情况下逐渐开始创造和产生的。人类自从有了文字，原创语言的存在，以及原先用语言交流和记录、表达事物的方式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有了书面和与之相关的存在形式。这个变化、发展，又一次飞跃，既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飞跃，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飞跃，它使人类“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②，使人类社会文化的存在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完善。

中华各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语言，很多民族则有自己的传统文字。研究少数民族古籍文献，除必须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之外，同时要研究语言、文字和古籍文献的关系。这是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各民族所创造的语言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文字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字里又包含着语言以及与语言相关的诸如思维等庞大的文化系统。语言和文字既然是用于记录、表述思想和文化的根本工具和载体，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字所包含的文化系统与该民族的语言所包含的文化系统有着内在联系；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与该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系统特征同样存在有机联系。不同民族的古籍文献包含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字，不同的语言和文字特点建构出了不同的古籍文献，从而熔炼、积淀着各自特殊的文化样式，共同展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奇光异彩。

在研究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和其中所包含的语言、文字时，有众多领域，其中有两个基本内容首先需要作出理解：一是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特别是文字的产生、类型、发展规律与民族古籍文献的样式问题；二是“民族古籍文献”的内涵。在这里，前者更多地涉及各民族古籍文献的产生、特点等，而后者则更多地涉及对民族古籍文献内涵的理解和界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上述问题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如对前者，仅就综合性成果而言，有李晋等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③、张公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 李晋等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成都，巴蜀书社，1997。

主编的《民族古文献概览》^①、乌谷著的《民族古籍学》^②，其他还有华宁的《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学》^③、《西南彝族历史档案》^④等专门领域的研究。在讨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古籍文献的关系时，老中青学者、名家辈出，并集中在《民族古文献概览》等书中，各放异彩。展示的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对中华民族语言、文字和古籍文献——包括藏缅语族古籍文献，如藏文、彝文、纳西文等古籍文献，壮侗语族古籍文献，如壮文、傣文、水书等古籍文献，以及突厥语族古籍文献和蒙古文古籍文献等等的系统发掘、介述。尤其是《民族古文献概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中的《中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献》、《民族古文字、古籍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等诸篇大论，系统揭示了中华各族的语言文字历史、特点以及由这些语言、文字特点所决定而构建出的各种文字古籍样式。这些揭示，使“民族古籍文献”展现出五彩缤纷的场面，使民族古籍文献文化的发掘研究呈现出波澜壮阔的景象。

对后者，即对“民族古籍”的理解和界定的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讨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包括哪些内容以及时间的划界等。所谓“古籍”，按字面作简单理解，“古”即是“古时”、“古代”，“籍”就是“书”、“书册”、“书籍”，“古籍”即是古时候遗留下来的“古书”。那么，古时遗留下来的古书、古文献资料中究竟什么是“民族古籍”或“民族古籍文献”？按照广义理解，凡古时候形成的，无论用汉文、外文、少数民族文字记录，凡涉及少数民族的书面载体资料，都属少数民族古籍。但需要说明的是，本项目研究的主旨不在广义所理解的民族古籍，而在于本学科所指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遗留下来的古籍。这个“古籍”，又需要作出广义理解。乌谷先生在《民族古籍学》中作了深刻地探讨，认为“本学科所研究的民族古籍除了包含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书面载体的古籍外，还有其特殊的内涵”，即“本学科所说的‘古籍’已经超出了‘古书’的范围”。根据这条思路，乌谷先生明确提出：“民族古籍就是指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范围内生活过的各少数民族，或正在生活着的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用文字，具有某种文化涵义的符号（文字的雏形）及口头语言记录下来的文化载体。这种文化载体可分为四大类型，即原生载体古籍、金石载体古籍、口碑载体古籍和书面载体古籍。”^⑤其他还

① 张公瑾主编，黄建明、岭福祥副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② 乌谷：《民族古籍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③ 华宁：《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④ 华宁：《西南彝族历史档案》，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⑤ 乌谷：《民族古籍学》，6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有较统一的认识。马更志先生提出：“民族古籍……范围既涵盖古代民族文字撰写的文献典籍，又包括民族语言流传的口头史料。”^① 彭继宽先生以土家族为例，称“土家族有语言而无文字，大量的古籍是通过民间口耳相传……这些古籍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经文、叙事诗、风俗仪式歌、歌谣等多种形式流传于民间”^②。司马义·艾买提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序言”中更有一句概括的话，说：“……少数民族古籍就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其形式有文字材料、口碑资料等……”^③《民族古文文献概览》一书的编者也有同样的概括：“我国各民族都有丰富的文献资料，有的民族虽没有代表自己语言的传统民族文字，但也保留下来大量的口头文献。”^④ 这些概括非常精当。只是应该补充一点，即那些有自己的传统文字的民族，在用文字书写记录历史、文化资料、并形成文字古籍文献的同时，同样传承着非文字记录，即用口头语言传承的古籍，亦即人们常说的“口碑资料”、“口传资料”、“口碑载体古籍”，或“口承古籍”、“口碑文献”之类。这种情况在我国的蒙古族、藏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彝族、傣族、纳西族等众多民族基本如此。华宁先生把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称为“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并按记录符号划分为“文字档案”等，按载体形式划分为“口碑档案”等。^⑤ 由此可以认为，本学科讨论的“民族古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事实上，它应包括各民族用于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包括表达语言、交流沟通信息、储存思维的某种特殊符号）所书写的，以及用语言和其他方式所传承的文化载体。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民族古籍”或“民族古籍文献”的时间断限。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机构的研究和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办发（1984）30号〕文件精神以及学者们研究的意见，“民族古籍”时间下限一般指1949年以前形成的文献载体，其范围涵盖古代民族文字书写记录的文献典籍和民族语言传承的口头（口传）史料。^⑥ 当然，民族古籍是一个不断创造和继承的历史过程，在今天看来是现实的东西，将来也是历史的。

① 马更志：《试论民族古籍事业的历史性发展——从甘肃省民族古籍谈起》，见李晋有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17页，成都，巴蜀书社，1997。

② 彭继宽：《土家族口碑古籍综述》，见上书，234页。

③ 司马义·艾买提：《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序言，5页，成都，巴蜀书社，1997。

④ 参见张公瑾主编，黄建明、岭福祥副主编：《民族古文文献概览》，前言，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⑤ 参见华宁：《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前言，1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⑥ 参见李冬生主编，莫福山、李晓东副主编：《新中国民族古籍工作》，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民族古籍研究或研究民族古籍，是一门具有特定对象和特点的学科，但它的研究意义远不限于研究民族古籍本身（如书写古籍的文字，古籍的创造，古籍书写与装订，古籍样式、种类、卷册，古籍保存、使用、收集、翻译、整理等等），更重要的还在于去发现和揭示古籍中蕴藏的一切文化内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都创造了自己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今天已被翻译、整理出来的那些古籍文献已经充分证明，历史遗留的古籍文献，是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各民族认识和改造自然以及在整个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文化的历史记录，是见证、解读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档案。这份历史档案是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总宝库，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都在其中得到储存和展示。正是有了这个宝库，今天的科学研究，尤其人文学科的研究，即随着民族古籍研究的发展不断得到拓展。科学研究借助民族古籍研究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拓展，一方面说明人们对古籍文献获得了新的认识，一方面实际上也回答了民族古籍这座宫殿里究竟保存着什么。

民族古籍里究竟保存着什么？无论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研究都力图在各自领域内挖掘出能证明历史的东西来。研究过民族古籍文献的学者们都有一句共同的话，说它是记录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此话一点也不夸张。事实上，现代学术研究已经在各民族传承的古籍文献里，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探寻出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内容。

第一，语言和文字学领域。这里特别要讲的是民族传统文字古籍文献中的语言和文字。语言是人类最先创造的交流工具，它储存着人的思维，并通过思维反映社会存在和社会文化。世界上任何一种人类语言包括各民族语言，都由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基本要素构成（有人主张四要素，即语音、语义、词汇、语法）。而文字则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用来记录和传达语言的符号。文字一经产生，它和语言相共生，两者不可分离。人类未产生文字之前，或用语言表达思维时，可以不用文字，但一定要有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否则无所谓语言。文字产生之后，人们表达文字乃至用文字表达的东西，可以用语言，也可以不用语言，但其中一定包含着反映人的思维程序的语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单从语言讲，它是人们从不同角度研究古代民族语言——包括语音发音、语言词汇、语言的语法结构、语言表达习惯、语言发展变化规律、古今语言、语词演变规律以及各民族历史语言相互影响规律等等的证明材料。再从文字讲，民族文字古籍文献除了具有记录语言的特殊功能外，它本身同时具有文字学所指的特殊价值，诸如文字的发生、文字的构造与结构、文字的发展演变、文字表达语言和思维的规律，直到文字书写格式、样式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借以考察文字学的特殊

证据和材料。现代民族语言和文字学研究，人们从不同角度作了探究，获得了诸如《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①、《中国民族古文字》^②、《我国民族的文字简况》^③等综合性成果。此外，尚有“焉耆一龟兹文”、“于阗文”、“古代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彝文”、“纳西文”、“水书”以及有关民族语言文字词典、字典等专门性研究的丰富成果。^④ 这些研究，无不与民族文字古籍有关，都得益于民族文字古籍文献。因此，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认为，如果没有各民族古籍文献，特别是古文字古籍文献资料的积累，也就无所谓古文字学的研究，更难有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历史学、民族学领域。历史学、民族学研究都是内涵深广的概念，各自有其特殊研究对象和内容。但就其所研究资料背景、素材而言，有一点是共通的，即都可以借助民族古籍文献。这是因为，民族古籍文献往往记录着汉文史籍所缺少的东西，或者记录着可与汉文史籍相互验证的东西。以这些资料为依据去考察民族学上的问题，诸如探究古代民族源流、分布迁徙历史、民族部落繁衍发展，直到社会组织结构、家庭婚姻制度等。今天，只要打开任何一部研究民族历史或民族学的专书，我们便可发现，其中都包含着对民族古籍文献资料的运用。虽然我们很难把那些借用古籍文献考察研究的结果都开列出来，但有这样一些典型例子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单以我国西南而言，有江应樑先生在普遍运用汉文史籍资料基础上广泛运用傣族民间传承的口传和文字古籍资料，探究傣族历史发展，著成的《傣族史》。^⑤ 冉光荣等

①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②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1982年铅印本。

③ 梁钊韬等编著：《中国民族学概论》，56、5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④ 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一书中载有马雍的《古代都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李铁的《焉耆——龟兹文的研究》，耿世民的《古代突厥文》、《回鹘文》，安瓦尔·巴依图尔的《察合台文和察合台文献》，史金波的《西夏文概述》，张公瑾的《傣族的文字和文献》，陈士林的《彝文研究的基础和前景》，和志武的《纳西古文字概况》，于宝林的《略论〈契丹文字的解读方法〉》，金启琮的《女真文字研究概况》等，他们的研究具有广泛参考意义。

⑤ 江应樑：《傣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江应樑先生在该书中多次提到对傣族古籍文献的运用。如在考察古代傣族分布区域即“百越地”时说：“今傣族民间，盛传其祖先早在三千年前就在瑞丽江两岸建立很多部落，3世纪时出现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尽管西方人士研究傣族历史有不少推论，但有一点可取，就是广泛收集了民间传说资料……”（见此书第2页）。在考察司马迁《史记》所载古代民族历史时称：“我们把傣族民间传说资料和《史记》所记的‘滇越’联系起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比较明显了。”（见同书第93页）。又称：“使我们高兴的是傣族民间流传的和用本族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传说都是极为丰富的，我们根据大量的传说，虽然不能比较具体的看出傣族的原始社会的发展面貌，但却让我们明确地知道有关傣族原始社会时期的两个重要的历史实际……”（见此书第141页）。

著的《羌族史》^①运用汉文古籍文献和传承于羌族和其他民族的古籍文献资料,探究羌族和相关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源流。方国瑜、胡庆钧等借助西南彝族民间传承《西南彝志》、《帝王世纪》、《勒俄特依》等彝文古籍资料,考察古代彝族从远古先祖“希母遮”到“撮朱读”以及“兹莫”乃至“六祖分支”繁衍、迁徙、分布和社会发展。^②郭大烈、和志武运用古象形文字和东巴经古籍资料,考察纳西族古族称、古族群和历史分布以及古代氏族、部落繁衍发展。^③丁文江根据古彝文记录揭示古代彝族繁衍历史,并编研出《彝族远祖及罗甸水西世系表》。^④史军超则以口承古籍《哈尼阿培聪坡坡》为据,探究出哈尼族古时分布地域和迁徙历史。^⑤类似研究例子很多。宗教学、民俗学研究在藏彝语族诸族中常遇到一个典型例子,即人死丧葬中,巫师要诵念口承或文字记录的《指路经》或“指路语”,意在为死者亡魂“指路”,把亡魂按照一定的路线“送回”远古祖先居住地。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非常重视这个现象,并用现在推至过去的历史反推法,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古代民族历史分布和迁徙,如李霖灿就根据纳西族古籍文献考究出《麽些族迁徙路线图》。^⑥除此之外,其他尚有诸如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断代,社会形态,社会政治、法律、军事乃至家庭婚姻制度等等的研究,所形成的成果很多都是在占有大量民族古籍文献资料基础上的理论探究。凡此,说明民族古籍文献无论对历史学、民族学研究都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当然,民族古籍文献对于历史学、民族学的历史考察,其作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它不能完全证史,这一点已经被学者们所看到。但它对于包括历史学、民族学及其他学科研究具有其他资料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则毫无疑问。

第三,宗教学领域。宗教学研究同样具有它特定的对象和学科特点,诸如研究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各种宗教信仰现象、内容和形式,特别是近代宗教学研究,人们除了研究宗教史学、宗教人类学之外,又开辟了诸如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等以及与宗教文化相关的学科研究。各学科、领域的研究都在不断发展,但这个发展并不意味着所研究的内容、

①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② 参见方国瑜:《彝族史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胡庆钧:《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③ 参见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④ 参见马学良主编,罗国义审订:《彝文丛刻》上册(增订),152~157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⑤ 参见史军超:《哈尼族迁徙史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哈尼阿培聪坡坡〉与〈诗经·生民〉、〈公刘〉等比较》,见李晋有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254~268页,成都,巴蜀书社,1997。

⑥ 参见李霖灿:《麽些研究论文集》,93页,台北,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

理论的穷尽和终结，它将继续，并且仍在发展。今天，我国的宗教学无论研究哪种宗教，离开各少数民族的古籍文献几乎是很难进行的。

人类的语言和文字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都是一种文化现象。少数民族传统文字，不能说它是为了宗教而产生，但它的产生和运用肯定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我国少数民族中无论诸如回鹘式蒙古文，还是突厥文、粟特文，到以印度婆罗米字母为原形所创造的藏文、傣文，乃至彝族先民创造的古彝文，纳西族先民创造的原始象形文……无论是藏文写成的佛教大藏经，或蒙古文大藏经，南传上座部巴利语系傣文大藏经，还是古象形文字东巴经，古彝文毕摩经，都是直接证据。它不仅证明文字和宗教之间的联系，同时也证明文字以及用文字书写和用口语传承的那些古籍文献，很多就是宗教信仰的内容和直接为宗教服务的。

宗教的核心是信仰问题。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有它的共同性，但更有各自的特殊性。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由于各种民族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语言等的不同，因此，反映在宗教上的信仰历史、信仰形态、信仰内容，以及信仰方式、仪式过程等都不同。宗教学研究注重实证材料和文献资料，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恰好在这方面给予了极大的补足。当然，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虽不能说全都是宗教经典，记录的全都是宗教，但可以说大多数是反映宗教内容的作品或经典。只要打开这些经典，其中记录的宗教信仰内容可令人目不暇接。仅以西南或云南少数民族而论，展开各民族古籍，以典籍名称而言，有景颇族传统的《天神木代斋瓦祭词》、《丧葬祭词》等，傈僳族的《仆帕苦》（唤祖）、《免此》（迎祭司）等，哈尼族的礼仪习俗歌《生与死》、《建寨》等，纳西族东巴经《祭天经》、《祭祖经》、《祭村寨神仪式经》、《祭署仪式经》、《祭风经》、《禳垛鬼仪式经》等，彝族《祭龙经》、《指路经》、《作斋供牲经》、《祭天颂祖经》、《百解经》、《驱鬼经》、《占卜经》、《呗毫叙谱经》等等，其数可以千、万计。再以记录范围而言，从宗教产生、宗教观念、宗教现象、宗教礼仪、宗教教祖、宗教规范、宗教体制、宗教斗争到宗教内容等，几乎无所不包。以具体内容而言，举凡天、地、日、月、山、水、木、石自然万物崇拜，灵魂及图腾、祖先崇拜，动植物崇拜，原始性力或生殖崇拜，原始占卜及巫术等等，无不展现了一幅宗教信仰，特别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历史画卷。

宗教研究，包括宗教历史以及所衍生的相关学科的研究，都要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各门学科的比较研究，最初事实上都曾得益于人们对人类最初宗教即原始宗教的研究。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记录着宗教信仰的众多形式和内容，特别是原始宗教的信仰，它为我们研究早期人类宗教的产生、发展、演变提

供了不少证据。仅此而言,今天学界产生的很多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说大都得益于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资料基础。

第四,哲学领域。这里主要指少数民族哲学。以前无论是学和写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人,都不知道或未提到少数民族有哲学思想。^① 这里面可能有客观条件所限,也可能忽视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首先可能忽视了对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文字和古籍的认识。我们反复提到少数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字,这首先是因为,少数民族语言同人类一切语言一样,包含着人的意识、思维过程,人的“意识和语言”的存在不仅“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②,而且其“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就是“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③ 人的“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④,这个“产物”即“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⑤,即是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获得的。人类在对客观世界的作用——即实践过程中获得思维、思想,在这个思维过程中,其结果是客观世界反映到人的意识里。所谓“反映”,也就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人的认识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感性认识,即借助于感觉和知觉;二是逻辑认识(理性认识),即借助于概念、判断和推理。这种逻辑认识,是借助语言来进行和完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说:语言和思维从它一开始产生起,就存在着天然的、内在的辩证关系,“语言”既“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⑥,又是反映人的思想的物质外壳,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⑦。所以,语言不但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和思维工具,同时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记录思维、传递思想、信息的系统。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无论口碑文献或文字文献,本来就包含着语言,自然也就包含和记录着思维认识内容。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它们记录的话语就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内容。

同样,过去无论学或写中国哲学、社会思想史的人,除了较少了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之外,不知道少数民族诸如瑶族有口头传承的创世史诗《密洛陀》,蒙古族有先人著作《蒙古秘史》,维吾尔族有《福乐智慧》,中国西

① 参见李国文:《纳西族古代哲学思想初探》,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2)。在文中,笔者首次提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对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几乎还完全是一个空白”,“我们写的中国哲学史也只能是汉族的哲学史,而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④ 《列宁选集》,第二卷,84页,转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⑥ 《列宁全集》,20卷,3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南边地偏僻山区彝族民间保存有古彝文著作《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生命的根源》，以及纳西族用古象形文字写成的东巴经《崇般图》、《白蝙蝠取经记——占卜的起源》等等，更不知道这些古籍记录中充满的哲理话语，原因除了当时不具备了解这些古籍的客观条件之外，未认识到少数民族也有思维认识发展史，也有与她们社会历史发展相适应的哲学及社会思想史，恐属认识上的障碍之一。

由上而论，中国传统思维、思想乃至哲学历史的考察，不能忽视对少数民族传统语言、文字和古籍文献记录的话语的考察。

各民族思维认识发生、发展的历史考察，各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发展水平、样式、规律的探索 and 比较研究，对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历史的研究，无疑是有重要价值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以往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中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不被人们所注意的情况才逐渐被改变。这其中，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资料的积累和开发利用起了关键性作用。现在打开这些研究成果，如《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资料选辑》（6集），《贵州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料集》（5集），《羌族思想史料》，直到《云南少数民族哲学思想论文集》（1、2），《南方民族哲学思想论集》（1、2），《北方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1、2），《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① 这些都是以少数民族古籍为基础汇集的资料集和所探究的成果。其他尚有很多专书专论，如肖万源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王天玺、李国文著《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王天玺著《宇宙源流——彝族古代哲学》，李国文著《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天·地·人——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窥秘》，班班多杰著《藏族佛教哲学》，龚友德著《白族哲学思想史》等等。^② 这些研究成果无一不借助民族古籍文献，甚至大多数直接就是对某种古籍文献所包含哲学、社会思想的理论挖掘和阐释。结论只有一个，民族古籍文献蕴含着各民族思维认识以及哲学、社会思想史，离开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

① 参见中国哲学史学会云南省分会编：《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资料选辑》（内部印刷资料）；贵州省哲学学会编：《贵州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资料选编》，1984年1月内部铅印本；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编：《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论集》，1987年4月铅印本；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② 参见肖万源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王天玺、李国文：《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李国文：《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李国文：《天·地·人——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窥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